

“文本诠释”与“现实投射”： 杜预、范宁《春秋序》中的历史与建构

许超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将“《春秋》始于隐”指向周平王与鲁隐公时间上的相接, 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亦承其说, 但二者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杜预在强调时间相接的同时, 亦将鲁隐公视为让国之贤君, 从而将鲁隐公比之周公, 对其有再兴东周的期待; 但在《穀梁》的脉络下, 范宁不能将鲁隐公视为贤君, 而只能冀望于孔子的“将来法”。也就是说, 在杜预、范宁笔下, 周公、孔子产生了不同的位阶, “圣人制作”的主体也就随之改变, 从而形成了“再造中兴”与“俟诸将来”两种不同的期待。究其实, 则是西晋初“绍开中兴”与东晋末“礼崩乐坏”的历史现实在杜预、范宁文本中的投射, 从而产生了二者对《春秋》与“圣人”的不同解读与诠释。但二者对《春秋》的解读并不仅仅是“知人论世”, 更是要“知事用世”, 期待《春秋》由经典文本进入历史世界, 从而使现世走向《春秋》所昭示的“王道世界”。

关键词: 《春秋》; 杜预; 范宁; 孔子; 周公

中图分类号: 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2-0015-10

历代《春秋》学研究认为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多有继承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之处, 故有“范承杜说”之论。但是细致梳理二家序可以发现, 其背后却有着深层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产生, 很大程度上是由杜预、范宁所处时代的变迁而引发的。这种差异投射到经典诠释之中, 就产生了极为不同的意义指向。历来学者多关注“范承杜说”,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种深层的文本差异性更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以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与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为中心, 对二者的差异性及其原因予以梳理, 希望能进一步推动经学文本研究走向更为细致化的路向。

一、“范承杜说”: 杜预、范宁“《春秋》始隐说”及其批判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

然后《春秋》作。”朱熹释之曰: “王者之迹熄, 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 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1](295)}孔子见王道衰微, 《诗》之不能复《雅》, 故作《春秋》以继之。然《春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 实平王之四十九年”^{[1](295)}, 既然以平王东迁为节点, 则《春秋》何以始于已到了平王四十九年的鲁隐公元年呢? 不妨来看看《左传》大家杜预是如何诠释的。杜预《春秋序》曰:

《春秋》之作, 《左传》及《穀梁》无明文, ……仲尼曰: “文王既没, 文不在兹乎?” 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 “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 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然则, 《春秋》何始于鲁隐公? 答曰: “周平王, 东周之始王也; 隐公, 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 言乎其位则列国, 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 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

收稿日期: 2023-05-18; 修回日期: 2023-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穀梁》经传汇校集注疏证”(23VJXG008)

作者简介: 许超杰, 男, 浙江慈溪人, 文学博士,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经学史、《春秋》学, 联系邮箱: ylsyxcj@163.com

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2](16-18)}

孔子伤时王之政，叹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杜预将《春秋》何以始于隐指向孔子之叹，更将《春秋》始于隐归之于时间上的“考乎其时则相接”。《左传》《穀梁》无述《春秋》何以作之明文，杜氏既将《春秋》之始指向平王东迁、隐公即位之际，则《穀梁》家又何言焉？

《穀梁》历代注释，固以范宁最为重要，不妨以范宁之说观《穀梁》家言。范宁《穀梁序》曰：

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孔子睹沧海之横流，迺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3](4-5)}

平王东迁之后，“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孔子视此时政之弊，故慨叹“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而“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故“因鲁史而修《春秋》”。“平王以微弱东迁”，以开春秋征伐不由天子之世，故以平王东迁“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

范宁之说与杜氏之序颇相仿佛，皆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为孔子作《春秋》之触因，又以“平王东迁之始王”及“与时则接乎隐公”为《春秋》始隐之缘由，无怪乎钟文烝言“范注用杜预者最多”^{[4](2)}。可以说，就《春秋》始隐诠释文本而言，范宁确乎有继承杜预之处。

虽然说后世《穀梁》家基本继承了范宁的“《春秋》始隐”说，但也有不同的声音。作为《穀梁》后学，柳兴恩就不认同杜预、范宁之说。柳氏论其所以治《穀梁》之学，即起于对“《春秋》何以始于隐”的疑问，其言曰：

《春秋》终于获麟而托始隐公之元年。杜预曰：“因获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此说允矣。至何以托始于隐元，忆自十岁外读《左氏传》时即怀此疑，见杜预“平王，东迁之始王；隐公，让国之贤君”云云，窃以为其词支嗣，是博访通人，均未有剖切言之者。^{[5](3066)}

《春秋》文本起止是《春秋》学的大课题，

也是每个《春秋》学家所要面对的问题。柳兴恩在面对这两个问题之时，认为其所以终于西狩获麟，以杜预“作起获麟，文止所起”之说为是；但就何以始于隐公元年，则以杜预之说为支嗣，且亦未有契心者。柳氏自十余岁对“《春秋》何以始于隐”发问以来，博采文献，皆未能有惬于其心者，而其对此一课题有自己的看法与解读，则是在读《穀梁传》之后，“专精治之，治之久而不觉数十年来之疑顿释也”^{[5](3066)}。柳兴恩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之疑顿释”者，是因为跳脱出了杜预、范宁的诠释理路，而直接进入《穀梁》传文体系。其言曰：

乌乎，《穀梁》之学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春秋》托始于隐之旨独在此矣。何言之？《公羊》予桓公以宜立，《穀梁》罪桓以不宜立。宜立，则罪在桓；不宜立，则罪在隐。传曰：“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以与桓，是则成父之恶也。”如传意，则隐在惠公为贼子。传曰：“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废天伦，忘君父。”如传意，则隐于周室为乱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夫所谓贼者，岂但割之刃乃为贼哉，成父之恶即贼子矣。所谓乱者，岂但犯上作逆为乱哉，废伦忘君即乱臣矣。乌乎，以轻千乘之国者而卒不能逃乱贼之诛，则千秋万世臣子之惧心必自隐公始矣。况传曰“先君既胜其邪心以与隐”，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托始于惠也。传曰“让桓不正”，见桓之弑逆隐实启之也，并明其无庸托始于桓也。且惠反诸正以与隐，隐乃不行即位之礼以启桓，是隐之纳于邪也。然则，隐之元年尤邪正绝续之交，《春秋》托始于此，即于不书“公即位”见之。^{[5](3066)}

柳兴恩将“《春秋》何以始于隐”的诠释建立在惠公、隐公、桓公的善恶褒贬之上，用“惠隐之间”和“隐桓之际”的善恶褒贬建构“《春秋》始隐”说成立的基础。他认为《春秋》之所以始于隐公，是因为隐公不自正而让位于桓公，故“隐在惠公为贼子”，“于周室为乱臣”。要言之，柳兴恩将《春秋》何以始于隐的诠释指向了夫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柳氏提出以“治

诸侯”为核心的“《春秋》始隐”义，就是建立在《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273)}的基础之上。隐公既然于惠公为贼子，于周室为乱臣，即为孔子修《春秋》而所当治的“乱臣贼子”。而隐公之所以成为“乱臣贼子”，是因为他“废伦忘君”，不即位为鲁君。是以，在柳兴恩看来，乱臣贼子非但是犯上作乱、弑君专权者，隐公能轻千乘之国以让桓，但其不遵兄弟之伦、君臣父子之义，实亦破义乱法之乱臣贼子。故以隐公为治乱臣贼子之始，“以轻千乘之国者而卒不能逃乱贼之诛，则千秋万世臣子之惧心必自隐公始矣”。而所以见《春秋》“正”隐公而又“治”隐公者，在“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隐也”^{[3](26)}。简言之，柳兴恩对“《春秋》何以始乎隐”的诠释，建立在对正“隐公之位”与治“隐公不自正”这两点之上。而“正”与“治”之核心，即“治诸侯”而“使乱臣贼子惧”^①。就《春秋》始隐之诠释而言，柳兴恩之说或更符合《穀梁》传文脉络，故其于范宁以降《穀梁》家之说多有不满：

范宁序袭杜预说而小变之，谓孔子慨东周之变，于时则接乎隐公，故因兹以托始，亦岂知《穀梁》之旨者哉？乌乎，自汉以来《穀梁》师授既不敌二传之多，至哓哓于《废疾》《起废疾》之辨，抑末也。^{[5](3066)}

柳兴恩以范宁承袭杜预而述《春秋》始隐之说为不知《穀梁》大义。进而论及两汉以来《穀梁》家，多为不知《穀梁》大义所在，亦不知《穀梁》所以善于经者也。

就柳兴恩之理解而言，范宁对“《春秋》始于隐”的诠释，不妨谓之“范承杜说”。而后世《穀梁》家对于《春秋》何以始乎隐的理解，亦多承接范宁之说。故《穀梁》家“《春秋》始隐”的诠释，却多被推究到了作为《左传》名家的杜预，此亦颇可玩味。

二、“绍开中兴”与“王道尽矣”： 杜预、范宁笔下的“平王东迁”

就《穀梁》的文本脉络而言，柳兴恩对范宁

的批驳不为无的放矢，范宁的“《春秋》始隐说”确非诠释《穀梁》经传所得，更像是接续杜预而来。但若言“范宁序袭杜预说而小变之”，则又不然。范宁《穀梁序》文本虽有似于杜预《春秋序》之处，但其间所存差异实亦颇巨。为说明杜预、范宁之不同，有必要再次回到杜、范二序文本^②。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2](18)}

当我们再次回到以上杜预的序文时，可以看到，在杜预笔下，《春秋》之所以始于鲁隐公元年，不仅是由于“考乎其时则相接”，更是出于“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平王继文、武、成王之绪，隐公承周公之德，平王、隐公若能接续先贤之功、德，故可“绍开中兴”，再造周室之盛，即序文所谓“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也。而之所以能对平王、隐公有此期待者，是因为于平王而言在确认天命所归，于隐公而言则是要弘宣祖业。武王灭周之先，八百诸侯会于孟津，武王犹以为未可，即所谓天命者也。天命不可测，故唯有“祈天永命”。但在天命之外，周公之于西周初期的历史，则是处人事之极。正是因为周公摄政、征伐诸侯叛乱，才最终奠定了西周之基业。反观历史，鲁公作为周公后裔，故当平王东迁之时，绍开中兴之业则有赖周公祚胤以扶之。但为什么是隐公而不是平王东迁之初的鲁惠公呢？因为在《左传》的诠释中，鲁隐公是让国之贤君，唯有隐公之贤可绍续周公之德。即如孔颖达疏所言：

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于地。^{[2](18)}

如孔氏所言，“绍开中兴”本是可致之事、可期之业，唯平王、隐公未能绍而开之，故致文武之迹坠于地也。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平王东迁可能是周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但也可以是“绍开中兴”的起始点。在杜预的诠释中,东周这一“衰落”抑或“中兴”的走向,是由平王与隐公共构的,即若回到平王东迁、隐公即位之时,并不意味着周朝必然走向衰落与灭亡。

但在范宁的笔下则不然,范宁《穀梁序》曰: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弑逆篡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是以妖灾因衅而作,民俗染化而迁。阴阳为之愆度,七耀为之盈缩,川岳为之崩竭,鬼神为之疵厉。故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天垂象,见吉凶;圣作训,纪成败。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盖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履霜坚冰,所由者渐。四夷交侵,华戎同贯。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天下荡荡,王道尽矣。^{[3](1-5)}

在范宁的笔下,“履霜坚冰,所由者渐”,西周之亡、平王之迁,并非一朝一夕之故,《小弁》《桑扈》《谷风》《角弓》《白驹》之作即此“所由者渐”的记录。不妨列叙此五诗之旨于此: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曰:“太子谓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谗,放逐宜咎。其傅亲训太子,知其无罪,闵其见逐,故作此诗以刺王。”^{[6](420)}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疏曰:“以其时君臣上下升降举动皆无先王礼法威仪之文焉,故陈当有礼文以刺之。”^{[6](480)}

“《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疏曰:“作《谷风》诗者,刺幽王也。以人虽父生师教,须朋友以成。然则,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时风俗浇薄,穷达相弃,无复恩情,使朋友之道绝焉,言天下无复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6](435)}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疏曰:“《角弓》诗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亲

九族之骨肉而好谗佞之人,令骨肉之内自相憎怨,使人劬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诗以刺之也。”^{[6](503)}

“《白驹》,大夫刺宣王也。”毛传曰:“刺其不能留贤也。”“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6](378)}

《小弁》《桑扈》《谷风》《角弓》《白驹》之作,以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不存、不正,故作诗以刺之。其诗之作,皆刺宣王、幽王者也。故在范宁的笔下,“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导致《小弁》《桑扈》《谷风》《角弓》《白驹》之作,即宣王、幽王之际,已使五伦崩溃,不复周室之旧矣。五伦坏而望其有治,盖不可得也。故“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不仅是一种历史叙述,更是历史罪恶累积的终局。其结果也不仅仅是“见祸”与“东迁”,伴随着“东迁”的是“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故两观表而臣礼亡,朱干设而君权丧。下陵上替,僭逼理极”,最终导致“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如果说在杜预《春秋序》的书写中仍然有着对平王、隐公的期待,那么范宁《穀梁序》中的“平王东迁”则已毫无浪漫色彩与乐观想象,其间唯有对王室衰微的深深绝望。

三、周公抑或孔子:《春秋》中的圣人制作

无论是杜预的美好期待,还是范宁的无望悲叹,历史的后见之明已经告诉杜预,也告诉范宁,更告诉我们,平王东迁终究只是走向衰落,而没有能够“绍开中兴”。那何以“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呢?其所以然者,“只为无法故也”^{[2](18)}。所谓无法,即礼崩乐坏。无论是冀望走出绝望,还是绍开中兴,所需要的都是重建礼乐。

故范宁认为:“孔子睹沧海之横流,迺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3](4)}即对于处于鲁哀公时期的孔子而言,面对世衰道微的世界,目睹了“文王之道丧”,故问“文不在兹乎?”进而得出“所以明不能复

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3](4)}的结论，但亦坚信重建文王之道则“兴之者在己”^{[3](4-5)}。故孔子“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3](4)}。而孔子“因鲁史”而“修”之《春秋》，即所以使“政化以被群后”、文王之道复兴者，亦“文在兹”者也。孔子以文王之道自任，其所以“兴之者在己”，即蕴王道于《春秋》也。范宁论《春秋》之黜褒贬、蕴王道曰：

（《春秋》）该二仪之化育，赞人道之幽变。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著劝诫。拯颓纲以继三五，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字之褒，宠踰华袞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3](5)}

幽王见祸、平王东迁，皆由于五伦之废。孔子作《春秋》以明黜陟、劝诫者，意在“拯颓纲以继三五”也，也就是要重建纲常五伦。由此可见，范宁认为孔子虽因鲁史而作《春秋》，但孔子赋予《春秋》褒贬之文、德义之辞，已使《春秋》从“鲁国一国之史”变为“百王之通典”“不易之宏轨”。易言之，《春秋》是孔子个人建构的“万世不易之法”。故如孟子述孔子之言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即“孔子作《春秋》，……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1](295)}。也就是说，孔子之《春秋》非“述”前王之业，而是“制作”后王之法、万世之法。

但在杜预《春秋序》中，则全然不同，《春秋》不再是孔子个人的“制作”，而是阐发先王（尤其是周公）之遗制。《春秋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2](10)}在杜预的笔下，孔子能“下以明将来之法”，先要“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也就是说，孔子为后世所示之“将来法”，其实仍是遵从于“周公之遗制”。就此而言，《春秋》所谓万世法者，并非是孔子的“制作”，而只是孔子“述”周公所“作”之“制”。《春秋》由范宁之“作”而变为杜预之“述”。杜预续论孔子之“撰”《春秋》曰：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2](10)}

杜预虽引《左传》论《春秋》“其善志”“非圣人孰能修之”之说，但其以“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释所谓“非圣人孰能修之”之论，更言“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2](11)}，则孔子之“善志”即“周公之志”、孔子所修即“周公之法”，则孔子只是述周公。是以，周公可谓“制作”以垂法后世，而孔子只是“述”周公之“制”与“志”，而不能谓之“制作”。孔子虽使《春秋》“成一经之通体”，但其所以为“经”者则在于周公之“垂法”。在杜预笔下，周公与孔子之位阶已截然分开，孔子虽允为圣人，而“制作”之旨则归诸周公。

是以，在杜预与范宁的笔下，“撰”《春秋》者虽皆为孔子，但所以赋予《春秋》之义、《春秋》所“制”之法，则分别归之于周公与孔子^③。然则，何以杜预、范宁笔下“制作《春秋》”之圣人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孟子曰：“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324)}“知人”以“论世”，“知世”以“论人”，是则先贤之教。就“知人论世”“知人论事”的角度来说，杜预、范宁之不同，与其说是二传家法之不同，或者说文本理路之差异，毋宁说是历史投射之差异^④。

四、“晋初能臣”与“晋末鲜民”： 杜预、范宁序中的历史投射

（一）周公辅政与晋初政局中的杜预

杜预生当西晋之初，佐晋武帝灭吴，结束汉末三国分裂局势，一统天下。西晋的一统，不仅使汉末以来诸侯割据走向政权统一，更是象征着天命复有所归，帝王之业得以赓续，是以下开“太康之治”。杜预于统一大业，实为灭吴第一功臣，故“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

绢八千匹”^{[7](1030)}。史言“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7](1025)}。值此大业开启之际，国家一统、天命以定，臣子所谓“立功”，即佐王事而已：

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滢滢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7](1031)}

杜预既佐武帝以定天下，又讲武修文，使王化被于万里。杜氏以王佐之才被称为“杜父”，南人歌之以“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则不免让人想起周公。汉末曹魏以降，周公被视为辅弼君主、定国成业最为重要之“先圣”，股肱重臣皆以“周公”比之。如魏明帝青龙年间，获白鹿，明帝即以此瑞方周公辅成王：

(青龙)四年，获白鹿，献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岂非忠诚协符，千载同契，俾义邦家，以永厥休邪！”^{[7](9)}

明帝以司马懿方周公，以之为股肱之臣，冀其辅己。虽然此后司马代魏，史臣所谓“终为弑君”^{[7](45)}，但明帝以司马懿为股肱重臣而比之周公，必无摄政、僭越之意。此亦可于魏明帝之重华歆见之^{[8](404-405)}，文烦不赘。晋承魏政，亦以周公比其重臣。西晋咸宁初，齐王攸将之国，曹志曰：“古之夹辅王室，同姓则周公其人，异姓则太公其人。”^{[7](1390)}即以辅佐王室之重臣比之周公、太公。东晋明帝间，诏曰：“昔周公匡辅成王，霍氏拥育孝昭，义存前典，功冠二代，岂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时之望也。”^{[7](165)}亦以周公为匡辅王室之人。而从这几条史文中又可以看出，晋人之称周公，与曹魏略有不同，即在注重周公匡辅王室的同时，亦重视其作为“宗室”的身份。

杜预虽不能比之周公，然亦股肱要臣，灭吴建国，与有功焉。且杜预“尚帝妹高陆公主”^{[7](1025)}，实亦可谓司马氏之宗亲。曹魏晋初

以周公比股肱重臣，而晋朝更突出“周公”的“宗室”特点。就此二点而言，杜预实可以“周公”自期。史文虽未有比杜预为“周公”者，然就时事、功业而言，杜预以“周公”自期亦无不可^⑤。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天下一定之时，天命以归，君臣定分已别，故臣子唯有作“王佐”，而不可有非分之想。以之况于周公、孔子，则周公为王佐，而孔子为逸民。若如《公羊》家言，孔子作《春秋》以当“素王”，则于周室而言亦是“乱臣贼子”矣。故杜预论孔子“素王”之说曰：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2](16-19)}

纬书以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公羊》家多从孔子“素王”之说。然就君臣之分而言，孔子为鲁臣，更是周民，以臣民而称“素王”，是所谓君臣上下之序乱矣，故杜预不取。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尚以为欺天，如之何能自称“素王”哉？是杜预所以不取也。这是从经典诠释的角度，以孔证孔，明孔子必不为“素王”。而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西晋之初，天命已定，亦不需要“素王”，而只需要“辅佐成王”之“周公”。故杜预就君臣之分而言，孔子只能是“臣/民”，而不能是“素王”。故杜预言孔子之作《春秋》，不过“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即《春秋》不过是述周家遗事、遗制，而非自立“新王”。杜预以“子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为证，即证孔子所欲“作”者，不过是在东都复“周”之制，以之为“东周”而已。是以，在西晋之初，孔子不可以“素王”之姿出现，“新王”也不被允许，而杜

预所期者也只是“周公辅成王”，而不是孔子之“新王”。

“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杼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2](1063)}杜预于太康之初作《春秋经传集解》，则《春秋》必不能为“新王”，而只能是述“周”、辅“周”、兴“周”之寄托^⑥。

(二) 孔子与晋末时局中的范宁

但到了东晋，偏安一隅，门阀勃兴。及至东晋末期，司马政衰，政令出于权门，非复西晋之旧^[9]。范宁生当东晋末期，其父范汪与桓温同时，而为桓温所抑，“终温之世，(范宁)兄弟无在列位者”^{[7](1984)}。范宁之注《穀梁》，则在范汪罢官之后，《穀梁序》曰：“升平之末，岁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轸，顿驾于吴，乃帅门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讲六籍，次及三传。”^{[3](7)}而其终篇，则在范宁免官之后，即“既免官，家于丹杨，犹勤经学，终年不辍”^{[7](1989)}者也。桓温于晋末执政，不仅关乎范氏一家，实亦把控东晋政局之走向。当此之时，周公形象亦由于晋末历史之投射，而有不同的面向：

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7](1966)}

简文帝临崩，诏桓温依周公摄政故事行政，然王坦之等不以之为是，更言“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其所以如此者，晋朝东渡之后，政出门阀，“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7](2365)}，而就桓温而言：

桓温事迹，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辟。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

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7](2364-2365)}

在此政由门阀、治出权臣之际，不再重周公之“辅”，而重在其“退”。盖权臣摄政，虽皆以周公自比，却隐藏代、禅之心，其实则异，亦人所共知者。“温初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怒。”^{[7](2579)}故需“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7](2365)}，即要防权臣、门阀之覬覦。田余庆先生言：

咸安元年，乃有桓温入建康，废海西公而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之事，打破了多年以来呈胶着状态的东晋政局。……自丁未至辛酉，桓温留都不过半月，朝局种种都确定下来了，一废一立，皆出桓温。从此桓温奠定了自己在朝廷牢固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权力格局。桓温置简文帝于皇帝地位，与当年置恹恹于徐州刺史地位一样，又一次使用了欲取先与的政策，不过这次是在最高的权力层次上使用。^{[9](177-178)}

虽然因为几家最有影响的门阀士族的联合抵制，桓温最终未能代禅称帝，但是东晋权柄已落入权臣之手，却是无可置疑的。所谓“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皇位转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范宁作为儒家后学，固不会认为周公存僭越之心，但其历历所见之事、权臣专政之现实，亦使其不得不寄希望于使乱臣贼子惧的“孔子”，而使假托“周公”以为之饰的乱臣贼子有以惧之。事实上，范宁的忧虑是极为合理的，毕竟范宁去世两年之后，桓玄即篡位称帝，二十余年后刘裕建宋，最终取代了晋朝。

范宁《穀梁序》所谓“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虽是春秋政局之旧貌，但更是东晋末期之现状。而其序所谓“父子之恩缺则《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礼废则《桑扈》之讽兴，夫妇之道绝则《谷风》之篇奏，骨肉之亲离则《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则《白驹》之诗赋”，不仅是对春秋末期孔子之世的描绘，也是

东晋末期之实况。当此之时，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叹，实亦范氏借孔子之口而兴其心之感慨。处东晋之末而思春秋之时，孔子所处已非复周公之旧，王辅之业不可得，王道之世不可行，则唯有俟诸将来。

据言孔子历试七十二国而不能行，退而讲学传道，终作《春秋》。范汪、范宁负王佐之才而不能为世所用，亦时势使然，故唯有寄望于讲学传经。范宁所行之事，实即孔子晚年所行之事。然孔子为圣人，可“制作”；而范宁为晋末鲜民，故只能述孔子之“制作”而期于后世。值此之际，已非周公秉政佐王之世，而是孔子无以兴道之时。故范宁不能以周公自期，而只能学孔子之守道待时^⑧。范宁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3](5)}其注《穀梁》，盖有待者也。以是之故，范宁之注《穀梁》，非专主《穀梁》一家，而以合汇三传、择善而从为归，其言曰：

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3](6)}

后人多以范氏注《穀梁》而不守《穀梁》家法为其短，然要归于范宁注《穀梁》之意，实是希望借阐发孔子之《春秋》以待王道之再兴。于范宁而言，传以通经，若以通经为鹄的，固不必专守一家。《春秋》蕴孔子之道，三传则通经达道之具，传之取舍、从违，要归于孔子之“经”而已。

杜预、范宁将《春秋》所蕴含的王道思想归之于周公、孔子，其异虽是经义分歧，但亦是时势使然。杜预生当西晋盛世绍开，故杜氏以周公自期，以王佐自任；范宁时值东晋之末，礼崩乐坏，政出权臣，故唯有寄情孔子，以《春秋》而待时清。就此而言，二序虽是对《春秋》的文本诠释，但更是时势的历史投射。

五、余论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将歿曰：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10](1944)}

昔人皆谓盖棺定论，当夫子于哀公十六年卒后，却是“盖棺”而不能“定论”。顾颉刚先生于百余年前作过一个题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的讲座，其言曰：

孔子只有一个，为什么会变做两个呢？唉，孔子哪里止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么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11](5)}

孔子形象确乎如顾先生所言，在历代变动不居，更被喻为“幻化之龙”^[12]。当然，最著名的大概还是“圣人”与“素王”。孔子作为“圣人”，这在近代之前是毫无疑问的；但孔子作为“素王”，却多有争议。如上文所说，杜预《春秋序》即直斥“素王”之说为不经之谈。但作为《左氏》先贤的贾逵却说“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2](16)}，合汇今古的郑玄也说“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2](16)}。若如上文分析杜预、范宁对周公、孔子理解之不同，杜预与贾逵、郑玄之异，盖亦时势使然。

吾人言杜预与范宁之不同，言“素王”与“圣人”之不同，不过是借着两晋历史，试图“知世”以“论人”罢了。我们借杜预、范宁之“世”以论二家《春秋》学之“事”，盖是“知世论文”。其实，岂止我们在“知世论文”，杜预、范宁笔下的孔子与《春秋》，又何尝不是“知世论文”呢？实亦是以己之“世”以况孔子之“世”，进而论孔子之“文”与“事”。所以，才会有历代变迁不居的“孔子”形象，也才会有不同诠释下

的《春秋》。夫子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272)}盖亦预见了自己未来的命运。

但杜预、范宁仅仅只是“知世论文”吗？当然不是。杜预所期者，盖以《春秋》之文、法，在西晋再兴周公之道、周室之盛；范宁所期者，盖以《春秋》之褒贬，在东晋再建夫子之道、王道之治。是以，杜预、范宁何仅是“论《春秋》”，实则更要“用《春秋》”。只是时势不同，所用不同罢了。然其之于《春秋》之道，却如范宁所言，“没身而已矣”。就此而言，柳兴恩对《穀梁》“《春秋》始隐说”的解读或许更接近《穀梁》文本脉络之诠释，但已更趋于局限于就文本而论文本，却没有理解范宁借夫子之《春秋》以用于当世之心。

注释：

- ① 关于《穀梁》之《春秋》始隐义，可参见拙作：《正隐以治隐：〈穀梁〉体系中的隐公叙事》，《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4期。
- ② 何休、杜预、范宁为《春秋》三传作注，注前皆有一篇或长或短的序言，是为《春秋》学上颇为重要的三篇文献。此三文皆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春秋》与各传研究史，但在此之外，杜预、范宁更在序中突显了经典与现实之互动这一面，这是何休序所没有关注的。本文意在比较杜预、范宁所作二序与当时政治的互动关系，故仅就杜、范二序立论，不及何休序。
- ③ 当然，杜预、范宁宗尚周公、孔子之不同，亦可推及今古学之异，参见廖平《今古学考·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廖平全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5月版，第26页。）钱宾四先生《孔子与〈春秋〉》引杜预《春秋序》后曰：“这是说孔子《春秋》只是遵着周公之遗制。……而杜预此说，实大背于西汉《公羊》学派的意见。”“这里便牵涉到《春秋》之‘义法’，牵涉到经学上‘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之分歧，牵涉到《左氏》学与《公羊》学之不同点。”（《孔子与〈春秋〉》，《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版，第269、268页。）钱先生就今古文学之别论杜预序中周公与孔子位阶之异。方韬从“周公作凡例”的角度提出，“肯定凡例为周公所作，孔子笔削《春秋》的意义就被大大淡化，而孔氏所做的工作不过是照录旧史并稍加修订，……周公居于孔子之上，使古文经《左传》能够凌驾今文经《公羊》《穀梁》二传而独享《春秋》的解释权。”（《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版，第320页）就周公与孔子而言，以今古文学立意

者甚多，姑引二家，以见一斑，余则不赘。

- ④ 《左传》《穀梁》家法不同、脉络殊致，杜预、范宁《春秋序》论周公、孔子之不同，固然有二家家法之异，但晋朝而降，已非恪守家法之时。钱宾四先生《东汉经学略论》曰：“窃谓当时经学分野，惟博士章句家法与博通大义之两途。而大抵治今学者，以守博士章句者为多。通古学者，以不守章句举大义者为多。……晚清经师又谓东汉今古文家法绝不相混，至郑玄注经而今文家法始失。此亦非也。大抵东汉儒生多尚兼通，其专治一经章句者颇少，而尤多兼治今古文者。……盖郑氏于经，成章句而不守家法。”（《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九州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89—94页。）则自东汉而下，尤其是郑玄之后，治经已多不守家法。杜预虽号称“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然亦曰“简二传而去异端”，孔颖达疏即曰：“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春秋左传注疏》，第15页）则杜氏亦非专守《左传》一家者也。范宁更是直言：“《春秋》之传有三，而为经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贬殊致。盖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义乖。……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俱失。”（《春秋穀梁传注疏》，第6页）非但不专守《穀梁》，三传皆可“弃其所滞”，则家法云云更无论矣。
- ⑤ 方韬认为：“杜预发明‘周公作凡例’的新说，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层的学术、政治原因。……司马氏父子喜欢以周公自比，这也可能是促使凡例附诸周公的现实原因。”（《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第323页）笔者以为，曹魏晋初将重臣比之“周公”，并非司马家族独享，而是君臣共同的期待。如魏明帝将华歆比之“周公”，固非司马家族者也。
- ⑥ 方韬《杜预“周公作凡例”说探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第314—323页）以杜预提出“周公作凡例”说为切入点，梳理东汉至晋初周公与经典关联的“生成史”，并将周公、《周礼》与晋初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为杜预《春秋序》中的周公与孔子寻找历史脉络。本文所谓历史投射虽有与方文重合之处，但方韬重在阐述晋初的历史背景，而笔者更强调《春秋序》文中所体现周公、孔子经学意义的现实必然性，二者仍有较大的差异。
- ⑦ 钱宾四先生言：“中国儒学最大精神，正因其于衰乱之世而能守先待后，以开创下一时代，而显现其大用。此乃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之特殊伟大处，吾人应郑重认取。”（《中国儒学与中国文化：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本校文化演讲会》，《新亚遗铎》，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342页）范宁之注《穀梁》、序《穀梁》，即此之谓也。

参考文献:

-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杜预, 孔颖达. 春秋左传注疏[M]// 十三经注疏: 第六册.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3.
- [3] 范宁, 杨士勋. 春秋穀梁传注疏[M]// 十三经注疏: 第七册.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3.
- [4] 钟文烝. 春秋穀梁经传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 柳兴恩. 穀梁大义述[M]// 续经解春秋类汇编.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86.
- [6] 毛亨, 郑玄, 孔颖达. 毛诗注疏[M]// 十三经注疏: 第二册.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73.
- [7]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8] 陈寿. 三国志[M]. 2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9] 田余庆. 东晋门阀政治[M]. 5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11] 顾颉刚. 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C]//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第四册.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2] 戴梅可, 魏伟森. 幻化之龙: 两千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

"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realpolitik": History and construction in *Preface to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y Du Yu and Fan Ning

XU Chaojie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Du Yu, in his *Preface to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explained tha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gins with Yin" as the time link between King Ping of Zhou and Yin Gong of Lu, while Fan Ning, in his *Preface to Gu Liang Zhuan*, endorsed Du's explanation. But there still exist hu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Du Yu, while emphasizing the time link, regarded Lu Yin Gong as a good king of the kingdom, compared him to great Zhou Gong, and expected him to start the revival of Eastern Zhou.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Gu Liang*, Fan Ning could not regard Lu Yin Gong as a good king, and could only lay expectation on Confucius' "future law". In other terms, under Du Yu's and Fan Ning's pens, Zhou Gong and Confucius were put in different important positions. Along with this, the subjectivity of "sage production" also changed, thus forming two different expectations of "re-creation in rejuvenation" and "waiting for the future".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it lie in the different realpolitik projected by Du Yu's text and Fan Ning's text with the former living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 period of "starting to revive revival", while the latter Fan Ning living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 period of with collapsed rites and corrupted morale.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times led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of sages. But their different readings of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lie not only in "knowing the human and commenting on the world", but more in "knowing the thing and utilizing the world", in the hope that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s a literary canon, can also walk into and exert impact on the real world so as to make the existing modern world move towards the "golden age" proclaimed by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Du Yue; Fan Ning; Confucius; Zhou Gong

[编辑: 胡兴华]